



塑造近代中国 牛奶消费

对近代上海乳业市场发展及其管理的考察

章斯睿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牛奶研究	(3)
第二节 研究对象和时段	(15)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资料	(18)
第二章 从无到有:近代上海乳业制度的初创	(22)
第一节 牛奶商品化	(22)
第二节 执照准入	(27)
第三节 检验制度	(42)
小结	(50)
第三章 追求品质:近代上海乳业制度的发展	(53)
第一节 困扰租界的牛奶问题	(53)
第二节 建立等级制度	(63)
第三节 等级制度与牛奶市场	(80)
小结	(92)
第四章 与鲜奶竞争:近代上海代乳品的发展	(95)
第一节 完美的话语	(95)
第二节 冲击母乳	(102)
第三节 华洋之间的竞争	(109)
小结	(120)

第五章 危机与挑战: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乳业的困境 …	(122)
第一节 战时体制下的牛奶业	(122)
第二节 统制体制的影响	(130)
第三节 救济品与战后乳品市场	(141)
小结	(151)
第六章 延续与争论:近代上海乳业制度与同业公会	(154)
第一节 一业两公会的形成	(154)
第二节 管理与发展	(164)
第三节 两公会合并	(171)
小结	(186)
结语	(190)
参考文献	(196)
后记	(207)

第一章 导 言

食物维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食品安全已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话题,牛奶更是其中焦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牛奶曾经作为征服者的食物,受到汉民族的排斥。^①除了西北游牧民族外,汉人和多数少数民族是很少食用奶制品的,奶制品“始终处于中国饮食体系的边缘,从未成为中国传统饮食的主流”^②。但今天,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成为乳品消费的主体。牛奶成为中国民众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奶粉,成为万千母亲哺育婴儿的重要选择。2008年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波及整个中国乳业,导致消费者对整个行业信任缺失,纷纷争购进口奶粉。这股争购热潮,在2013年导致欧美多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出台措施,限制中国大陆消费者大量购买婴儿奶粉。奶粉问题进一步蔓延到了其他食品,引发国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忧思。此后,“食品安全”成为网络媒体、学术界及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如果重新检视百年前的乳业,就会发现其与今日的乳业格局,大为不同,如图 1-1 所示。

① (美)尤金·N.安德森著,马嫫、刘东译:《中国食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第140—141页。

② 王书吟:《哺育中国:近代中国的牛乳消费——二十世纪二、三〇年代上海为中心的考察》,(台北)《中国饮食文化》,2011年第1期,第215页。



图 1-1 传统售牛乳者

资料来源：《图画日报》1909 年第 99 期，第 8 页。

图 1-1 形象生动地展现了 20 世纪初牛奶业的某个侧面，从中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第一，在 20 世纪初，大多数中国人喝牛奶还是直接从牛身上直接挤出，不经其他手续。第二，牛奶是一种老少皆宜的冬令补品。第三，牛奶中掺水问题严重，所以消费者要在一旁监视挤牛奶的全过程，以免受到讹诈。这三点也正是本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书主要介绍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乳业市场的发展和政府的管理措施，除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外，还将描述当时市场发展的情形，探索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旨在书写一部近代上海牛奶产业史，尽管在书中必然要处理对乳业市场的论述和分析。本书更希望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将牛奶这种古已有之的食物置入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在商

品化过程中,勾勒出制度的变迁,析论行业标准是如何建立以及对市场产生何种影响。

第一节 牛奶研究

一、传统行业史和技术史中的乳业发展史

现有乳业史研究通常作为通论的一个章节,或地方志的部分内容,以及畜牧专著等形式出现。

在通史性著作和地方志中,乳业作为地方农业经济的一种代表被列入考察对象,强调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的变化。以上海为例,张俊杰主编的《上海商业(1949~1989)》就将乳制品作为副食品商业的一种加以介绍;《上海农垦志》和《上海畜牧志》也介绍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情况,从乳牛育种繁殖、饲养防疫到牛奶供应,两者都以1949年后发展为主,对1949年前的情况涉及较少。^①对1949年前发展阶段的论述,一般突出乳制品商业化的过程,并突出其作为农业生产商品化的特点之一。《上海近代经济史》和《上海通史》还进一步指出,民国时期的乳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农业的经营方式,上海的畜牧农场就是这种代表。^②由于乳牛一般都蓄养在上海郊县,所以在上海郊县地方志中对本地蓄养乳牛及开办乳场的经历也有所介绍,如川沙、宝山、嘉定等。^③

^① 张俊杰主编:《上海商业(1949~1989)》,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270页。《上海畜牧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畜牧志》,上海市畜牧办公室内部资料,2001年,第104—128页。《上海农垦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农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45页。

^②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1895—1927)》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5—406页。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经济》第八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245页。

^③ 上海市浦东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川沙县续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上海市宝山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宝山区志:1998~2005》,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第649页。上海市嘉定区畜牧水产局志编写组编:《嘉定县畜牧水产局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8页。

除了出现在通史和地方志中,乳业通常作为畜牧经济和畜牧科技的一部分被加以论述。从民国以来就有不少专家学者从畜牧经济的角度,积极提倡乳牛养殖和牛种改良。罗振玉在其创办的《农学报》上就倡议引进良种奶牛,此后《农学报》上曾刊登日本学者河相大三述所著的《牛乳新书》,并由湖北农务局沈纮编译。^①就笔者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检阅所得,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牛乳研究》是最早研究牛奶的中文专著,书中介绍了奶牛种类,牛奶成分,罐头、奶粉、酸奶、奶制品的营养等。民智书局还将该书列为“家庭必备之书”,认为此书能使国人对牛奶的性质和用法有“明白认识”。^②此后有关牛奶研究的专著也不断问世。1936年金嗣说编纂的《牛乳及其制品之研究》,将人乳、羊乳、山羊乳、其他动物之乳做了比较,认为牛乳是最好的营养品。^③吴信法的《牛乳及其制品》和顾学裘编著的《牛乳研究》等,也都是民国时期乳品研究的代表著作。^④谢家驹的《乳品学》附有外文乳品学名著目录、乳品检验报告单和主要术语译名对照索引等。^⑤这些专家的著作比较侧重于介绍乳品的种类、乳牛养殖技术、牛奶的营养要素、化学成分、检验方式和乳制品开发利用,对近代以来乳业制度的建立过程和乳品行业在全国范围的传播,虽已稍有涉猎,却仍然比较简单化,往往以“受西方影响”一言蔽之,忽视了乳业制度和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情况。

① 《牛乳新书卷上半篇》,《农学报》1900年第112期。《牛乳新书卷下(乳篇)》,《农学报》1900年第113期。

②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1911—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民智新书集刊》第二辑,民智书局出版社1935年版,第144页。

③ 金嗣说:《牛乳及其制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④ 顾学裘:《牛乳研究》,中华书局1940年版。

⑤ 谢家驹:《乳品学》,浙江文化印刷公司1948年版。此外,还有潘念之:《乳牛饲养学》,中国农业书局1936年版。

1949年后,部分著作除了被各大专院校继续使用外,另有张天才、金世琳等相关著作问世。^①以上著作多是留学回国的农学专家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对乳牛饲养以及牛奶的生产流程和卫生管理做全面详尽介绍,力图引进当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推动中国乳业发展。1949年后随着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的成立,推动了畜牧兽医学术交流和技术推广工作,也加强了专业书刊的出版。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苏联专家的著作和教材^②;与此同时,由中国畜牧兽医学会负责收集整理和编辑畜牧业文献史料,陆续出版了《中国古代畜牧兽医史》《中国畜牧史资料》《中国畜牧史料集》以及《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和《中国现代畜牧兽医史料》,其中都收录了与乳业相关的论文和学术资料。^③以1992年中国畜牧医学学会主编出版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为例,该书汇集了清末至“文革”前我国畜牧医学方面的主要文献,对1840年至1965年间的我国畜牧业的组织机构、生产技术和各类学术研究以及政府管理进行了纲领性的勾勒,从整体上简要介绍了乳业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发展的历史。

从时段上来看,乳业发展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刘希良、张

① 金嗣说编的《牛乳及其制品之研究》1950年商务印书馆再版;谢家驹的《乳品学》由北京中央轻工业部食品处1951年再版作为教材使用。张天才,《养乳牛》,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金世琳编,《牛乳加工中副产品的利用》,轻工业出版社1959年版。

② [苏]伊尼霍夫等著,黄立本、陆城译:《乳制品化学分析(实验)》第一卷《牛乳及乳制品的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苏]西尔巴科娃·K:《提高乳牛产乳量的方法》,畜牧兽医图书出版社1956年版。[苏]阿葛福诺娃·E:《我怎样把每头乳牛的产乳量提高到7432公斤》,财政经济出版社1954年版。

③ 邹介正等编著:《中国古代畜牧兽医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王毓瑚编著:《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编:《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版。蔡无忌、何正礼编著,中国科学社编辑:《中国现代畜牧兽医史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年版。

保峰等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中国乳业发展的历程,刘贤俊突出中国乳业在1949年前处于不利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对外商占据大量市场份额以及战争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作出批评。^①王利华、张和平和尉麒珺等,通过古籍的研读,探讨了古代乳制品消费的方式以及汉民族接收乳品的流变。^②从现有研究时段来看,乳业史研究比较集中于古代,尤其是中古时期,对近代以后的乳业史发展缺少更为具体细致地分析。

从区域上来看,除了传统游牧民族聚集的西北外,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已有回顾性研究。^③《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对北京、南京、重庆、温州等城市的乳业做了初步描述,其中收录了王毓峰和沈延成对上海乳业的介绍文章,早已于1984年发表,该文首次回顾了上海乳业发展的历程,并将乳业分为“萌芽阶段(1865—1897)”“牛奶棚阶段(1898—1922)”“牛乳场阶段(1923—1948)”和“畜牧场阶段(1949—1965)”四个成长阶段,并介绍了与乳业相关的各种卫生制度,为后来者研究上海乳业

① 刘希良、张和平:《中国乳品工业》2002年第5期,第162—166页。张保锋主编:《中外乳品工业发展概览》,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5年版。顾佳升:《我国“奶文化”的演变》,《管理世界》2006年第11期。曹幸穗、张苏:《中国历史上的奶畜饲养与奶制品》,《中国乳业》2009年第11期,第80—84页。刘贤俊:《近代中国乳业的苦难历程》,《中国乳业》2002年第6期,第34—35页。

② 王利华:《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中国农史》2000年第4期,第82—87页。张和平:《中国古代的乳制品》,《中国乳品工业》1994年第4期,第161—167页。尉麒珺:《农耕民族与乳制品:中国人对乳制品的食用史》,“亚洲食学论坛”会议论文,浙江杭州2011年。此外还有刘贤俊:《古籍记载的中国乳业》,《中国乳业》,2002年第5期,第33—34页。

③ 罗丰:《中国北方乳制品制作与消费的历史——一个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考察》,(台北)《中国饮食文化》第4卷第2期,2008年7月,第115—177页。曹幸穗、苏天旺:《香港开埠早期的奶牛业(1842—1899)》,《古今农业》2011年第2期,第105—113页。曹幸穗、张苏:《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乳畜饲养与乳品生产》,《古今农业》2009年第3期,第79—87页。洪丽雯:《日治时期台湾牛乳饮用的开展与文化意涵》,(台北)《中国饮食文化》(第7卷2期)2011年7月,第79—120页。

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①董德宽等人则简单介绍了上海乳业在 1949 年后的新变化及对未来的展望,他认为在 1949 年后社会环境相对安稳,虽小有波折,但是人民政府始终鼓励发展乳业,这一时期还涌现了各种提高乳产量的技术和设备。^②此外,尚有南京、延安等地的研究者,从回顾行业的角度,对当地乳业做简要描述。^③

然而,由于这些学者多是农学专家,故他们更关注技术革新和扩大生产,反映在叙述上,则较多强调牛奶产量的提高和奶牛数量的增加。在他们看来,技术进步必然带来乳业发展。但是,笔者不禁要问,乳业发展难道仅仅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产量提高吗?如果新技术确实提高了产量,那么大量产品进入市场后要如何被市场“消化”呢?

二、牛奶作为商品:知识传播与文化塑造

对历史学研究来说,乳制品不仅涉及生产与制造。社会大众如何消费牛奶既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也反映在社会文化中。何炳松早在 1930 年的《通史新义》中就强调要在经济史研究中加入消费的视角,而且他还认为,“经济史不能不顾及消费史,对于消费者之自然需要——即物质生活史——有了解之必要”。^④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在消费各种物质的时候,不仅仅是出于这种物质的实用功能,也是由于某些文化需求。可以说,牛奶作为经济商品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尤其

^① 中国畜牧兽医学学会编:《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4—89 页。王毓峰、沈延成:《上海市牛乳业发展史》,《上海畜牧兽医通讯》1959 年第 4 期,第 1—14 页。

^② 董得宽、陈新:《上海乳业简史与前瞻》,《上海农业科技》1996 年第 4 期,第 31—34 页。董得宽:《上海奶业 1949~1999》,《上海奶牛》1999 年第 3 期,第 1—6 页。

^③ 蒋伟清:《南京奶业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奶牛》2000 年第 6 期,第 6—9 页。李琦珂、曹幸穗:《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地区奶畜饲养》,《中国农史》2012 年第 3 期,第 31—37 页。

^④ 何炳松:《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第 260—263 页。

是近代以来的国人为什么选择消费牛奶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

自民国初年乳制品商品化以来，其消费量显著上升，但是当时乳品市场集中在上海这样的东南沿海大城市，而不是有着悠久喝奶习俗的西北牧区。那么，这种以都市居民为主要销售对象的消费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刘俊贤认为是这些城市在受到西方人的影响而开始饮用牛奶，由需求造成市场。^①他没有深入分析乳业在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中的传播和消费的复杂过程。陈玉箴在对日占时期台湾乳品消费的研究中提出“牛乳作为一种因自然限制原盛产于西方的产品，何以能克服气候与身体的限制，进入并盛行于台湾市场？”在她看来：“饮食适应的过程，不仅关乎影响乳品市场开展的政治、经济要素，亦关乎人们如何克服身体上可能的不适，进而接受并推崇一外来的食品。”^②

近代的牛奶消费，除了西俗东渐的解释框架外，还必须注意知识的传播及其对婴儿哺育方式的影响。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 20 世纪初牛奶代替母乳，成为婴儿哺育的新方式。^③他们都强调了“强国保种”话语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葛淑娴(Susan Glosser)也曾撰文强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在民国社会的流行，这种话语被受过西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形成了中国人消费乳品的重要理由之一。她特别使用了前文提到的民国乳品知识专著

① 刘俊贤：《近代中国乳业的苦难历程》，《中国乳业》2002 年第 6 期，第 34 页。

② 陈玉箴：《乳业发展与营养论述：日治时期台湾牛乳消费文化的普及》，（台湾）政治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 http://cfes.nccu.edu.tw/new2011/list.php?language=&group=WORKING_PAPER&n=0&c=0 2013 年 3 月 13 日 20:08 检索。

③ 卢淑樱：《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香港）中华书局 2018 年版。周春燕：《胸哺与瓶哺——近代中国哺乳观念的变迁（1900—149）》，《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0 年 12 月第 18 期，第 1—52 页。王书吟：《哺育中国：近代中国的牛乳消费——二十世纪二、三〇年代上海为中心的考察》，（台北）《中国饮食文化》2011 年 7 月第 1 期，第 207—239 页。

来讨论当时知识分子对牛奶的认识和消费牛奶的必要性,由于牛乳在古代中医文献中是作为药用而非食用被加以论述的,这与民国时期的牛奶论著有很大的不同,民国时期的牛奶论著更突出了“科学”“卫生”“营养”等现代概念,也特别强调身体健康对民族强盛的重要性。不过,由于葛淑娴过多使用科技专著强调知识所构筑的话语权,考虑到这些著作的专业性和发行量,可能产生的影响相当有限。尽管她也提到了乳品商人促进了牛奶消费,但是却忽视了商业活动的具体层面。^①

科学话语结合商业推广使牛奶被国人接受,并成为饮食的一部分。民国商人在促进商品消费时使用的各种促销手段,包括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所使用的不同方式,在促使消费者购买牛奶时,商家要如何运用科学话语和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运用各种商业宣传刺激消费者购买,已有学者进行了研究。王书吟和李忠萍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广告的考察,认为近代牛奶消费经历着从奢侈品转变为大众消费品,并在西式标准下向机械化大生产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被赋予强烈的“民族主义”象征,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建构和寻求现代化的重要体现。^②

以上关于近代牛奶消费的论述都关注了牛奶与身体的关系。在《牛奶的近代性:以营养和卫生为中心的思考》^③一文中,王凤展

① Susan Glosser, “Milk for Health, Milk for Profit: Shanghai’s Chinese Dairy Industry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herman Cochran (ed.), *Inventing Nanjing Road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9. pp.207—233(中文版见葛淑娴著,章斯睿译,潘玮琳校:《为健康还是为利益:日占时期的上海华商乳品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58—387页)。

② 李忠萍:《从近代牛乳广告看中国的现代性——以1927~1937年〈申报〉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06—113页。

③ 王凤展、余新忠:《牛奶的近代性:以营养和卫生为中心的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5年第16卷(下),第1—24页。在该文中,作者将“近代性”等同于“现代性”。

和余新忠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总结,他们对牛奶的近代意象展开探讨,特别强调“健身强国”就是牛奶作为现代性商品的特点之一。

从文化角度固然能解释中国人饮用牛奶的原因,但是对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否能被“强种救国”“卫生清洁”的话语所引诱而改变呢?法国学者萨班(Françoise Sabban)认为,饮食习惯并不是可以轻易被改变的,例如欧洲人即使知道昆虫富含蛋白质,也不会食用。她还认为应该将中国的牛奶消费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全球视角来观察其变化,并特别强调雀巢公司在华经营对中国人消费牛奶所造成的影响。^①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补充文化解释的某些不足。如果不能对上海牛奶市场有总体的把握,就容易对消费行为形成一定的误解。例如,本地鲜奶市场以“消毒牛奶”为主,由于生奶被市政当局禁止直接饮用,而多数华商奶棚又无力负担高昂的进口消毒设备,且达不到工部局或上海市政府所规定之细菌指标,故不少小牧场和农民将自己奶牛所产之奶售予营业规模较大的牛奶场,形成上海乳业市场中的“拆奶”现象。在1929年上海市社会局对全市乳业的调查中,发现持照的牛奶场常向牛奶棚和郊区养牛的农民收购牛奶以调剂其产销平衡。高居价格顶端的是以A.T.T为代表的消毒牛奶,生奶只能作为原料,经过消毒加工后才能出售,也因此形成了牛奶市场上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甚至引发了行业内部对“消毒”的争议。^②这部分市场面貌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没有提到,但又确实存在于上海地区乳业发展的过程中,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尽管已有不少乳业经济学研究成果,但是关注焦点主要是在

^① Françoise Sabban, “Milk Consumption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ood Habit”. (未刊稿)《第十二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第397—420页。

^② 详见后文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产业组织、市场营销、发展战略、区域竞争和危机管理等,对于1949年前上海乳业市场研究则相对较少。^①袁成毅的研究虽然运用了档案材料,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民国时期英瑞公司的鹰牌炼乳和温州百好炼乳厂生产的擒雕牌炼乳为商标问题而引起纠纷。^②但这个研究并不包括上海市场,而且只能看成是民国时期乳业市场发展的一朵小浪花,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值得探讨。

如果缺少历史性的分析,就会给研究带来局限性,例如前文提到的通史性著作和地方志都曾对上海乳品市场有所描述,但是他们的研究往往忽视了近代以来乳业内部发展的差异。晚清以来,在中国销售的乳制品,除了液态奶之外,还包括炼奶、奶油、黄油、奶粉等。相对于鲜奶较为“本地化”的发展,以炼奶、奶粉为代表的乳制品业则更为“全球化”。^③这是因为鲜奶生产后,如果不能保存在适当温度下,则在48小时内会发生腐败。因此,鲜奶生产必须临近奶源和市场。晚清以来,上海本地鲜奶主要依靠浦东川沙和其他近郊地区提供。相对而言,奶粉和炼奶则可以长期保存,利于长途运输,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向中国出口奶粉和炼奶等罐头奶制品,并在1945年后威胁到上海鲜奶市场。

三、卫生的牛奶:制度史视野中的乳业市场

在笔者看来,上海牛奶市场的特点之一是规则先于话语。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建构近代上海乳业制度方面,具有开创性和引导

^① 参见郝晓燕:《中国乳业产业安全研究——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内蒙古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8页。还可参见谭向勇、曹暕等:《中国奶业经济研究》中《附录3:有关奶业经济的专著和学位论文的名录》,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

^② 袁成毅:《民国时期中英炼乳品牌纠纷案探析》,《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第57—61页。

^③ 这种观点亦可参见 E. M. DuPuis, *Nature's Perfect Food: How Milk Became America's Drin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p.8。

性。因此,对上海地区的乳品研究离不开对制度的探讨,特别是基于公共卫生角度的乳品卫生制度。

近 20 多年来,医疗社会史正逐渐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了疾病医疗和社会史互相融合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此领域的研究,这股风气影响到台湾地区史学界,“中研院”史语所在 1992 年成立了“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形成了医疗文化研究的热潮。大陆方面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注这个领域,但直到 2003 年爆发非典型性肺炎(SARS)之后,才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①

现今学界对医疗社会史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疾病史和城市公共卫生史。后者又以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和通商口岸为主要研究对象,既包括对城市卫生事业的整体探讨,也包括专门考察环境、食品、学校、妇婴等方面的管理。^②这些研究丰富了学界的认知,同时,还尚存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城市食品卫生管理,虽然已有学者对上海租界的行政措施进行了系统梳理,还缺乏具体地阐述。^③

以牛奶为例,20 世纪乳业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政府权力的全面介入。自从西方医学知识,特别是预防医学传入中国后,政府为保障大众健康,在管理食品市场方面设立了各种卫生标准。卫生监督体系建立的同时也影响到相关食品市场,食品卫生法规是最早出现的专业法规之一。其中,对于乳品最为重要的是巴氏消毒

^① 陈蔚琳:《晚清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探析 1854—1910》,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第 3—4 页。

^② 李忠萍:《“新史学”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述评》,《史林》2009 年第 2 期,第 173—186 页。近来,也有研究关注到如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参见毛姝静:《一九四〇年代成都市公共饮食卫生及其管理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2 年。

^③ 陆文雪:《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史林》1999 年第 1 期,第 64—82 页。

(Pasteurization)技术被确立为卫生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①

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存在对巴氏消毒以及后续政策制度梳理不清的情况,对其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的实际运行也缺少描述。在以往的乳业研究中,专家所书写的相关论著较为强调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标准化生产,对制度造成的市场分析有所欠缺。在论述食品卫生管理和立法时,一般会涉及乳品管理,但这些研究多是政策解读,或仅仅罗列乳业监管制度的产生。^②顾佳升初步爬梳了上海地区实行巴氏消毒的历史,从历史个案出发,描写了当时工部局处理违规企业的经过,但他没有考虑到这项制度建立的过程和复杂性。^③陈柏生、余树川和徐跟涛的个人回忆涉及管理牛奶业的制度以及各种事件和经历,但其立场有失偏颇。^④

美国学者扎普里克(Alan Czaplicki)在探讨芝加哥市政府引进巴氏消毒制度所引起的争论和反复时指出,市政关系对制度创新

① 巴氏消毒,又称为巴氏杀菌法,“是对产品的一种热处理过程,旨在避免同牛奶有关的病原性微生物造成公共健康危害。巴氏杀菌作为一种热处理,意图使牛奶在化学、物理、感光方面引起最小的变化,避免公共健康受到危害的卫生意义是:虽然乳中的病原性微生物不能全部消灭,但有害的微生物数量已经减少到不足以构成显著危害健康的水平。巴氏杀菌减少了产品中腐败菌数量,从而延长了某些产品的保质期。”——国际乳品联合会编著,国际乳品联合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等译:《英汉乳业术语词汇》,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② 朱德明:《上海公共租界食品检疫初探》,《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6期,第8—10页。陆文雪:《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史林》1999年第1期,第64—82页。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9—82页。

③ 顾佳升:《历史资料显示:巴氏杀菌奶是可以标“鲜”的》,《中国乳业》2006年第12期,第8—9页。

④ 陈柏生:《上海牛奶业的惨痛史》,《20世纪文史资料文库》第3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70页。徐根涛:《川沙奶牛发展简史》,《川沙文史资料》1989年第1辑。余叔川:《上海牛奶业艰苦成长史》,《长宁文史资料》1990年第6辑,第36—40页。此三人均为乳业从业人员,对其叙述应谨慎使用。

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任何看似“进步”的技术并不是一开始就顺理成章地被接受,甚至纳入法律体系,而应该考虑“本地化”过程中的利益纠纷等。^①

虽然上海的历届市政府都建立了无数的标准以约束牛奶商的各种不法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市民能喝上纯净的牛奶,但是各项指标的建立是否确实降低了违法案例,是否提高了牛奶品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的王凤展和余新忠的文章也将“卫生”作为探讨牛奶近代性的重要维度。他们论述牛奶业在近代中国的引入和发展时,存在“从个体到专业化”“从危险到卫生”的问题,这与本书所要探讨的产业形成和卫生管理的演进在某些方面是不谋而合的。但本书将对其中的细节进行展开,并侧重商业秩序和利益的博弈。

具体来说,首先,与乳品相关的制度都以西方制度为蓝本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公共卫生中的新议题——食品安全;其次,这些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医学知识的背景之上,尤其是受到19世纪细菌学影响的巴氏消毒技术;最后这些制度的产生和实施过程不仅仅是中国公共卫生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由于最早实行这种制度的行政机构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这一机构本身对这一新技术和新制度的认识和接收存在各种问题。例如,是否对外商和华商采取“双重标准”?这个制度的推行对上海的乳业市场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本地商人面对新制度是何种态度?有着何种利益纠葛?这些都将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议题。

^① Alan Czaplicki, “Pure Milk Is Better than Purified Milk”: Pasteurization and Milk Purity in Chicago, 1908—1916,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31 No.3(2007), pp.411—433.